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6.05.0011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探析

史洪飞, 樊春红

(东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中国梦”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族国家内的表现形式。“中国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梦”的提出为重新审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时代条件。马克思文本揭示出共产主义要回到人本身,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主义要实现人性复归,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表征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指向了马克思文本的哲学史来源,揭示了康德自由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思想同构性,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来源于康德自由理论。康德的先验自由、道德自由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现实自由,这是共产主义之路,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马克思;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57-06

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一种乌托邦,或者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美好社会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因此,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造成这个后果的原因是在现实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文本原意的遮蔽和实证化的倾向。所以,我们要解蔽共产主义,回到共产主义的人性本身,揭示共产主义与康德哲学的思想渊源,赋予共产主义以现实性和合理性,恢复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之本来面目。这就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搭上了数条可以沟通的桥梁,马克思因此与整个西方思想史实现了融合,共产主义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场现实的运动。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体系,实现了现代哲学革命。马克思赋予实践概念以基础性作用,以此为逻辑基点构建了共产主义的新哲学,共产主义不再是对现存世界的解释,而是对现存世界的重新构造,再造了新的现实,实现了改变世界的哲学梦想。哲学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是从世俗眼光的认同现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造现实。这是一场伟大的哲学革命,因此,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一、重新审视共产主义的时代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求共产党人达到的首要标准是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46}。《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62}针对这样的时代要求,一个时代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是实践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从理论上无法阐述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我们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呢?理论的混乱和迷茫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和

收稿日期:2015-08-2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GJB1214007);东北石油大学培育基金项目(NEPUPY-2-0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ZXB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B028);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JGXM_NEPU_201607)
作者简介:史洪飞(1972—),男,黑龙江大庆人,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共产主义的理想虚无化,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实践遭受的历史性失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阶段的发展应以理论的彻底化为基本原则,彻底化的要求是不能回避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因此,“中国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3],这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族国家内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表达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核心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实的人包括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联合体两个结构。“中国梦”正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中国梦”理论的核心是人,这个“人”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从特殊的角度看,人是指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人,因此,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人的外在结构联合体的必然过渡环节和特殊表现;从普遍的角度看,人又是作为普遍人性而存在的人,这个普遍人性就是指现实人的核心即内在的自由,“中国梦”讲的人民幸福正是普遍人性实现的载体,幸福是作为现实的人的追求目标。“中国梦”是共产主义的特殊表达,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在十八大后重新审视共产主义的时代因素。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来源有无可争议的历史文本,这些文本就是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但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理解和解释却是众说纷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关键文本都与恩格斯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另外,《资本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后出版的。第一个马克思文本的解释者就是恩格斯,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恩格斯开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都进行着自己的解释,另外上述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己的解释路径。可以说,有多少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有多少种对共产主义的解释。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理论的解释者,更重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因此,

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解释就有了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意义。理论的正确性更加有助于实践的成功。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经典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马克思的这个经典文本提示了共产主义阐释的新方向,它将引导我们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共产主义本身。随后,马克思在自己的一系列经典文本中沿着这个逻辑思路不断地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在这里暂且不去分析这些文本,我们主要分析上述这段引文中所揭示出的新的阐释路径。

在这段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经典文本中,马克思论证了理论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社会的变革只能通过社会本身内部矛盾的解决来实现。已经存在的社会统治力量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当其丧失了现实性的时候,是不会自己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能通过社会本身内含的对立面即另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来迫使它退出历史舞台,建立新的现实性。物质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运动中,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理论是不能代替作为武器的批判的物质力量的,两者之间是有明显界限的。在这个问题上,对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认识,马克思既继承又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从康德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后继者,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批判的武器即理论具有优先性,理论对世界具有先在性,世界是理论中的世界,理论是在其内在视域中切中世界的。因此,他们仅仅局限于批判的武器,或者以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回避了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样的解决思路不能接受,必须予以批判。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

西,是具有不同质的两个事物。马克思并没有否认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和价值,也不是要推翻一个形而上学王国再建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王国。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实际上在马克思前人那里已经隐含在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中,武器的批判往往都是以批判的武器面目出现的。马克思解决的思路是首先进行区分,然后论证其辩证关系。两者之间的区分是明晰的,问题的关键是两者之间的联系。马克思首先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即理论可以建构现实,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取得的伟大理论功绩。不同的物质力量里面潜伏着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怎么判断物质力量的新与旧。或者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个物质力量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哪一个物质力量已经具备了当下的现实性。能承担这个功能的恰恰是理论本身。先进的理论是在引导着社会前进的,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因此,从康德到青年黑格尔派所构建的批判的武器之中的合理性已经成为马克思开始展开自己理论创新的前提了。所以,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具有各自的存在合理性,两者之间不能互相代替,但两者之间存在通约的可能,这个可能就是理论来源于物质力量又建构物质力量。那么,理论是如何来源于物质力量又建构物质力量的呢?两者不同质,要实现通约,必须要找到一个与两者都同质的媒介,这个媒介只能是人,因为人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作为精神的人与理论同质,作为物质的人与物质力量同质,人对物质力量的反思形成理论,理论通过人作用于物质力量,由此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作为黑格尔之后新的哲学创立者,在理论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如果仅仅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在理论与社会变革之间建构了一个中介,就是群众。对于群众这个中介,马克思曾经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尝试,最后固定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意义上现实的人的实现载体。一旦建构起群众这个中介环节,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就实现了辩证转化,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物质也可以转化为精神,群众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中间环节。这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逻辑准备。这个中介环节的建立也为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只是作为某种理念以不同的形象存在于各种文本中,更多地是作为空想存在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中。当马克思继承共产主义的理论遗产、提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时,

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也还只是一个理念而已。如何摆脱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概念幻影、建构自己的新共产主义,是困扰马克思的一个理论难题。这个理论困境的破解就是通过对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关系的突破实现的。共产主义理念如何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一直在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发现了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的中间环节,为共产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找到了可能。这也是马克思把德国理论从天国引向人间的开始。

提出群众作为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的中介,这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如何解决问题,还存在很多理论断裂:理论如何才能掌握群众?即使理论掌握了群众,理论又是如何变为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在解决这些理论断裂的时候,不断运用先验哲学方法论,对经验的先验条件进行了彻底的追溯。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动力,即自我超越的努斯精神。马克思的这个特点在其中学时代就很明显了,被称为身上有一种“魔”。群众是无数个体的集合,同一个理论如何能被无数个体认同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理论必须切中个体的普遍性。就个体的特殊性来说,同一个理论不可能适用于无数特殊性个体。但理论可以适用于无数个体的普遍性,因此理论就能掌握群众。群众的普遍性表征为人,人就是作为群众的个体的普遍性。人在这里体现为一般性,表现为具有普遍人性的人。因此,理论切中了个体的普遍性也即理论说服了人,进而就掌握了具有相同普遍性的群众。但只有普遍性的理论才能说服普遍人性的人。理论的普遍性以彻底性为标准。马克思直入问题的核心,认为抓住事物的根本就是彻底性。那么,理论的彻底性是指什么样的事物的根本呢?上面讲到,理论要说服人,所以理论抓住的事物的根本应该与人的根本是一致的,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指人性本身。共产主义最本质特征就是回到人本身。人本身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自由,自由是人本身的标志,自由对人来说是人性的最充分表达,所有具体的人性样态都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指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正是因为人的社会性,人才能成为人。自由与社会性是人本身的两个根本属性,自由体现为内在性,社会性体现为外在性,两者统一于人本身。人性中的自由与社会性是作为一个矛盾体存在的。人性的内在矛盾外化为西方哲学中的两种精神:一种是自我超越的努斯精神即人性中的自由,一种是自我规范的逻各斯精神即

人性中的社会性。自由和社会性作为人性的两个根本属性是使人性得以成立的先验条件,正因为此,人性才能保证是属人的,而不至于沦为兽性,人才能回到人本身。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性的自由才是人性的本真存在,或者说自由的界限是其社会性。善与恶乃是自由的产物,自由的滥用是恶的根源,但人性已经先验地设定了抑制恶的条件即人的社会性,这是善与恶的界限,也是人性与兽性的界限。共产主义是回到人本身,是人性的回归,也是人性善的胜利。共产主义就是那个掌握群众并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理论。共产主义不仅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与它的实践能力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实践能力体现为废除宗教神性,回归世俗人性。既然上帝的秘密已经被揭穿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事实已然成为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彻底性必然成为人的行动纲领,转化为行动能力,这个行动能力就是人的实践能力,因此共产主义必然转化为物质力量,借此摧毁已经丧失了现实性的物质力量,所以,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与康德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关联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还继承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使用黑格尔的概念演绎论证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之间的联系,充分展示了辩证法方法论的逻辑力量。与此同时,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方法论,那就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恰恰是借助于这些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对其进行批判与改造,为自己新哲学的创立提供方法论支持。当马克思要处理共产主义整体架构的时候,他更多地是使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论证概念之间或者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当马克思要深入问题内部,实现理论的彻底化时,他更多地使用康德的先验哲学方法论来逐步深入地寻找理论的基础和支点。先验哲学方法论是在建构结构,辩证法是在联结结构。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往往处于对立状态,互相僭越对方,唯心主义认为理论在先,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在先,都无法建立稳定的结构。马克思则使用了先验方法论,寻求理论与物质力量的存在条件或基础。先验方法论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寻求经验得以存在的先验条件。马克思找到的这个条件或者基础就是人,并因此建立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三点稳定的结构。理论的结构化是现代性的一

个明显特征,也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只有怀疑论和后现代主义是结构的杀手。但过度结构化倾向容易造成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使理论自身走向自我毁灭。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马克思自然深知过度结构化的危险。所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辩证法和康德先验方法论拿过来就用,而是对其进行批判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方法中内嵌着西方哲学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精神:一个是自我超越的努斯精神,一个是自我规范的逻各斯精神。这两种精神植根于人性的内在矛盾。^[5]这两种精神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结构中都有清晰体现,使其理论的现实感大大增强。在康德那里体现为自由与道德律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体现为否定与反思的统一。马克思继承了这两种精神,不仅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其精髓,而且还延伸到实践领域,用于解决实践问题。这是共产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重要理论动因。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要兑现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必须要有结构的,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乌托邦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因此,共产主义要实现其现实性,必须建立一个现实性的结构,理论、群众和物质力量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正是这个现实性的体现。这个结构的中心是群众。群众是马克思在理论初期使用的与现实的人同义的替代词。群众在控制着这个结构,保证既不让理论吞噬物质力量,又不让物质力量摧毁理论。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又是流动的。因此,共产主义始终处于自我完善状态。这个结构已经体现了努斯的超越精神与逻各斯的规范精神。现实共产主义运动曾经犯过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有意识地忽略该结构中的群众,导致结构僵化,走向封闭,最后自我毁灭。

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段文本的分析,引出了对共产主义的新解释方向。这个方向一方面要进行彻底的文本分析,以揭示马克思经典文献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必然引导我们走向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史来源。这个追溯的结果会表明一个理论事实,即康德自由理论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其实,我们在上述这段文本的分析中已经随处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了。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与康德哲学在思想上的关联

我们要从各种马克思主义者退回到马克思本身,再从马克思本身退回到马克思文本本身,最后退回到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史来源本身。德国古典哲学

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思想史来源,从此入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文本有个彻底和明晰的解释。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最直接的思想来源,这个解释是从恩格斯开始的,列宁继承了这个解释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沿着列宁的思路前行的。那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起点,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既然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那么康德哲学肯定也是这个思想来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关键是康德哲学到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什么思想资源?国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与康德的关系,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形成了很多学术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俞吾金。俞吾金已经就康德与马克思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6] 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具体形态上来源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欧洲传统本来就有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积淀,但从哲学基础来看,康德自由理论则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未来社会的构想,还是一场现实的运动,所以马克思是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成果的,是在批判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基础上继承西方哲学精髓的,因此共产主义是理念与现实的统一。从理念看,共产主义是西方古典哲学思想逻辑彻底发展的一个结果;从现实看,共产主义是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先天缺陷的现实出路。作为理念与现实的共产主义,其统一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不仅是作为基本原则与理念存在于共产主义的论证中,更重要的是自由要实现其现实性。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西方古典哲学自由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对西方古典哲学关于自由思想精髓的继承与创新,最直接的思想传承来自于康德哲学,而康德哲学的实质就是自由。马克思自由概念与康德自由理论具有清晰的逻辑同构性。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与联合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自由和联合体构成人本身的先验结构。从马克思与康德理论的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康德目的国,目的国是自由与道德律的统一,因此,自由和联合体的理论来源于康德的自由与道德律。我们说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对康德哲学来说,马克思也颠倒了康德的自由理论,使之从先验自

由、道德自由的形式主义走向了实践的现实现自由。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以共产主义为旨向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是以多种形态表达的,但其核心是自由。自由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石。马克思自由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是康德的自由理论,康德自由理论是西方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马克思自由概念与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的思想传统有着内在的逻辑传承关系。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的逻辑路径首先是,康德自由理论是西方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植根于人类生存冲动中的西方哲学核心精神即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两者的对立统一推动着西方哲学的辩证发展,康德自由理论是其产物。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的“理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形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上帝”概念的哲学构架。“上帝”概念的内在张力分裂为近代哲学中大陆唯理论的“理性”与英国经验论的“经验”。“理性”与“经验”的统一形成了康德自由理论。其次,可从康德自由理论的逻辑谱系和精神实质来考察。在康德哲学中,纯粹理性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能力是纯粹理性的本质,实践能力具有两个互为因果的属性即自由和道德律,自由与道德律的统一形成了康德“自由意志”概念。自由意志内在张力逻辑地发展到“至善”,至善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即德福一致。范畴超验运用即理性形成三个理念:上帝、灵魂不朽和自由。上帝和灵魂不朽内在逻辑发展到至善。德性是至善的内在条件,是含自由的道德律,其最高表现就是“目的国”,其中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立法的意志。康德自由理论确立了人的理性、自由、创造力,人是目的。在“目的国”中,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仅是手段,这就是康德自由理论的理想。这也是康德自由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具体包括:具有努斯精神的自我超越的合目的性的自由理念;具有逻各斯精神的自我规范的合规律性的自律理念;理性具有两种能力,即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实践能力是理性的本质;自由与道德律互为因果对立统一形成的自由意志理念;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理念;“目的国”理想。康德的自由通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康德的“目的国”是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康德自由理论已经确立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前提即理性、自由、创造,但他的“目的国”还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马克思将其从康德的天国拉到现实的人间,内嵌在现实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之内。康德的先验自由、道德自由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现实自由,这是共产主义之路,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实质就是自由逻辑的发展,因此康德、马克思不过是这个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前后传递的思想接力。这里可以进一步表明,康德、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自由逻辑框架中不断深入探讨的自由概念是人的普遍性价值的表达,表面看来是存在于西方哲学和文化语境中,实质上是人的普遍性价值追求的反映。人的普遍性价值必然要通过某一个文化载体呈现出来,一个抽象的没有载体表现的普遍性存在对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任何普遍性存在都要通过某种质料显现。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那些在为人及其权利能得到实现不断进行理论论证的思想家——在思想上不断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在现实上不断实现自由的现实性——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征着人性的回归。人的普遍性价值追求所获取的精神和现实的成果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个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特权,更不是某一种文化的专属物,它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属于所有人的精神财富。因此,康德、马克思对自由的前后传递式论证是为了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对马克思来说,就是

实现共产主义。

综上,通过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经典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分析,揭示出人性复归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人性复归是以人的自由为其表现形态的。人的自由作为一个理论逻辑点与康德哲学实现了沟通,这也直接确证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5]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65.
- [6] 俞吾金.实践与自由[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109.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of Marx's Communism

SHI Hongfei, FAN Chunh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8, China)

Abstract: "China dream" is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communism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 The ultimate goal of "China dream" is to realize communism. The proposal of "China dream" provides the time and conditions for the reexamination of Marx's Communist ideology. Marx's text reveals that communism is to return to human itself. It points out that man is the highest essence, and that communism is to achieve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alist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mmunism is represented by the community of freemen. Humanity regression of communism points to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Marx's text and shows the isomorphism of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and Marx's communism thought. Marx's communism thought is based 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Through Marx's "practice", Kant's transcendental freedom and moral freedom turn into the communism real freedom. This is the road of communism, and also the theme of freedom i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Marx; communism; community of freeman